

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及其镜鉴

原宗丽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民主弊端的日益凸显,在西方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潮流,其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备受关注,巴伯在诠释民主“强”、“弱”意义的基础上,批驳了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缺陷和弊端,提出了以“参与”为核心的强势民主理论作为对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修正和补充。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不仅推进了西方民主发展的进程,也为当前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镜鉴。

关键词:巴伯;弱势民主;强势民主;镜鉴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9)02-0034-04

在当代社会,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自由主义民主作为一套政治性理念,在理论界已经拥有了独占性的话语权,但自由主义民主一系列弊端的日益凸显给民主政治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学术界的反思。其中本杰明·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因其鲜明的特征,在西方学术界备受瞩目。巴伯将自由主义民主称为弱势民主,指出其在理论建构、认识论以及对人的认识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强势民主。强势民主作为当代的一种参与型民主理论,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参与为核心,以“公民身份”、“共同体”等理念弥补和修正了弱势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体现了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趋势,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强势民主理论批驳自由主义民主为弱势民主

巴伯从美国民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出发,对当前民主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独占性已经成为其自身发展的桎梏:西方世界的民主未来的发展似乎已经完全依赖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命运,尤其是依赖于美国政府体系及其所支撑的自由主义文化的命运,自由主义民主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近乎垄断的行为。以此为基点,巴伯指出,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在发展实践中处于霸权优势,在自由问题上强势的,但在民主理念上却是弱势的。因此,巴伯将自由主义民主称为弱势民主,并对

弱势民主的特征及缺陷进行了剖析和挖掘,从而为我们更深层次地认识自由主义民主提供了一个新视阈。在巴伯的视野中“强”与“弱”是一个相对意义的概念,它是针对民主价值而言的。从本质上讲,自由主义民主赖以为基础的人性论、知识论和政治观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其民主价值是谨慎的,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自由主义民主只是把民主视为实现自由的工具或手段,往往表现为对民主价值的某种不信任,甚至是排斥。因此,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弱势民主。

1. 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难以形成对个人自由的真正保护。巴伯认为,尽管自由主义民主以保障和促进个人自由为核心和承诺,但在自由主义民主论者看来,每个人都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谨慎地度过自己的生命,最终在令人恐惧的孤独中死去。在自由主义民主论者视野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人类存在最显著的特征是疏远、相互分离,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的纽带,也不是任何共同体的成员。在巴伯看来,自由主义民主这种不稳固的基础使其不可能“形成有关公民资格、参与、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美德的坚实理论”^[14],自由主义只是将人们安全地隔离开来,而不能富有成效地聚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可以强有力地抵制对个人隐私、财产、利益和权利的侵犯,却无法有效地抵御针对共同体、正义、公民性以及社会合作的侵犯。于是,自由主义民主中的个人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抽象存在是绝对安

收稿日期:2008-1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课题《当代参与型民主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07JA810011)

作者简介:原宗丽(1977-),女,辽宁沈阳人,讲师,博士,从事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

全的,但对于真实历史中的个人而言,由于他处于抽象的安全网络中,所以他们始终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中。显然,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这些缺陷使得其完美的理性模型在真实的实践中变得满目疮痍,因此,巴伯认为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最终就会削弱和难以形成对个人的有效保护。

2. 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是一个奇特的、复杂的,同时也是自相矛盾的政治体系。尽管自由主义民主外在表现出一种至佳的状态,但巴伯认为,自由主义民主隐含着无政府主义、现实主义和最小政府论的倾向,它们彼此有时和谐共存而更多时候则是处于紧张状态。于是巴伯对这三种倾向进行了病理学的分析。一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巴伯看来,自由主义认为政治的目的是受个人及其自主范围限制的,个人在本质上是独立的、自主的、相互分离的、自由的行为主体。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所坚持的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它源自绝对的个人主义,推崇绝对的个人权利,反对国家的干预,排斥政府的强制,对他们而言,“自然”意味着“自由”,“共同体”意味着“强制”,自由与国家权力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两者之间的困境是无法摆脱的。二是现实主义倾向。在自由主义民主的实现过程中,现实主义倾向更多关注于政治权力,它认为在绝对权威与绝对自由、完全强制与完全放任以及政府与无政府之间是不存在任何中间地带的。现实主义倾向试图通过具有强制性的权力、法律以及利维坦式的国家来抑制因个人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从而通过权力对人们自由的解救来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卫。但它在解决冲突的同时却将“个人的自由”与“放纵”一起根除殆尽,这种在内部的被撕裂、自相矛盾使自由主义民主陷入两难境地。三是关于最小政府论倾向。与前两者相比,最小政府论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配置现实主义主权者的权力。最小政府论者倡导的是一种宽容的政治:“在这种政治生活中,节制预先包含在每组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对每一项个人自由的放弃都是由先定契约所规定的,对每一项权威的承认都是以保障权利为基础的,对每一种个人权利的放弃都必须维持在某种限度内”^{[1]17}。因为面对冲突只能选择容忍和宽容。尽管这是一种仁慈和令人钦佩的态度,但是它在本质上并不能阻止任何伤害,同时由于它对个人(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权力)都不信任,因此最终也陷入了两难困境之中。

3. 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动物管理的政治。上述自由主义的这三种倾向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牵制的。它们之间可以通过封闭的循环论证方式连接起来,且每种倾向都为其他倾向可能患有的病症提供切实有效的免疫力:最小政府论对集体权力的不信任抵制了

现实主义以大众权力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力的倾向;现实主义洞察出无政府主义不能对私人强制与市场不平等质疑,因而对合理的国家权力观念提供了支持;无政府主义在所有社会关系中都强调个人的优先性,排斥共同体和具有实质性的共同观念。在巴伯看来,这种思维逻辑是通过逆向推导方式进行的,即每一种问题的解决恰恰是以另一个更难以处理的问题为代价。因此这三种倾向都试图使人们相互分离而不是彼此聚合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被塑造成了动物园的形象。“在这种动物园中,充满了所描述的各种动物和家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狮子,高贵的狐狸,胆怯的绵羊和卑鄙的冷血动物,缺乏同情心的野猪和处于管理地位的鲸鱼,狡猾阴险的狸猫,机灵的郊狼,品行恶劣(通常披着羊皮)的狼,最后在汉密尔顿令人恐惧的想象中,人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野兽。”^{[1]22}根据这种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演变成了一种丛林中弱肉强食的斗争。因而巴伯指出,尽管自由主义的三种倾向对于人性描绘的关注点各异,但它们的相似点在于认为人们之间不可能和谐相处、共同生活,而隐藏在这三种特性背后的逻辑导致了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循环状态,这成为了自由主义民主处于备受争议的脆弱状态的因素,因此,最终“它没有向我们说明如何通过创造公共利益来解决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1]22},也没有能够找到转化冲突的最佳路径。

由此,巴伯认为尽管自由主义民主仍在当代世界的民主发展中处于主导位置,但是其“弱势的”内在缺陷和矛盾却造成了其自身无法解决的政治困境。在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自由主义式的个人看起来并不能承担其想象中的重任。自由变得与自私自利难以区别,并且由于冷淡、疏远和道德沦丧而变得腐化堕落;平等变为市场交换,同时也与它本来需要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相脱离;而幸福则是通过利于其精神品质的物质满足来衡量”^{[1]25}。因此,巴伯提出了强势民主理论对其进行修正和弥补,值得注意的是,巴伯的修补方案只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补充而不是激进地替代。

二、强势民主理论倡导一种参与型的强势民主

在巴伯视野里,强势民主是一种独特现代模式的参与型民主。“它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使公民联合起来的不是同质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使其公民的共同目的和互助行动成为可能的不是他们的利他主义和其他美好的性格而是他们的公民态度和参与制度。”^{[1]145}

1. 强势民主是一种崇尚“参与”的政治。强势民主“从字面上讲,它是公民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冒用

公民名义的代议制政府。在这里,积极的公民直接进行管理,他们并不必须在每个层次和每个事件上进行具体管理,但是在作出基本决策和进行重大权力部署的时候他们必须经常充分地 and 详尽地参与”^{[1]180}。显然,强势民主反对弱势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议制——所谓公民的参与只有在投票时作为选民团体时才得以体现,在投票结束后,这个团体就消失直至下一次投票。公民在被代表后成了一个零,其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就丧失了,“除了让人家统治他以外,便无事可做了”^{[2]74}。强势民主倡导公民直接参与自我管理 and 自治,但这种“参与”并不是要求公民在所有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上都直接参与决定,但是它强调在重大问题、重大政策上都必须保证公民充分的、直接的参与:对重大问题的议程设置、审议、立法和政策执行,在制度的设计上,能够体现公民参与,而不只是依赖代议制政府的精英。

2. 强势民主的参与以公民身份为立足点。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人性是极端个体化和孤独的,因此人们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为了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从人的本性来讲,人性中除了其私利的一面,还有其重要的社会属性一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内在每个个体的抽象存在,事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势民主正是以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政治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为公民身份辩护的:“如果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那么人类就必须在公民身份和奴隶身份之间作出选择。”^{[1]256}在巴伯看来,只有当我们拥有公民身份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而且我们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在被当做公民身份的时候才能持久稳定。显然,强势民主要求我们要认真对待公民身份,通过共同的公民身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因此民主既不是多数人的统治,也不是代表的统治,它是公民的自治,拥有了公民身份,才会拥有共同体意志和公共意图;拥有了公民身份,才能更好地理解诸如自由、平等、正义这些政治价值。相反,如果没有公民,那么只有精英政治或者大众政治。

3. 强势民主的参与以共同体为依托。在巴伯看来,自由主义民主通常将民主视为一种选择、一种多数派的偏好,这种认识不仅将互惠互利还原为变动的多数人的无节制的任性,而且也没有对多数派偏好的强度和应承担的责任作出相应的回应。强势民主是以判断而不是以偏好为依据,将决策理解为人具有创造者的一面,所以它关注公共意志,它是一种共同体的政治。强势民主的参与正是以公民共同体为依托对公共事务问题进行公共讨论和行动的,并通过共同体使单独的个人转化为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公民,创造出具有公共性的共同体。当然,共

同体在强调公共性的同时并不排斥公民个人的独立性。公民和共同体是政治现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共同体的特征来源于组成成员之间共同拥有的特征,但共同体不是公民个体之间的简单集合,它通过共同参与和观察促使个体成员转化成为了公民,共同体是创造公共善和公共目的的伴随物;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共同体的方式来构筑他们的政治自由,这使得公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同时不会毁灭他们的差异性,也不会损害他们的自主意志,这样共同体在促进人与人相互依赖性的同时也不会牺牲对公民个人身份或自由的认同。

4. 强势民主的参与为冲突的转化提供了可能。自由主义民主将冲突看做政治的中心,从霍布斯到拉斯韦尔都是将政治视为解决冲突的方式 and 活动。而强势民主则主张通过蕴涵于共同体中的公民参与、公共讨论和公共行动来解决矛盾、转化冲突。强势民主的共同体并非像统合性民主那样严格要求利益的同质性和一致性,相反它承认存在着私人利益的竞争以及由竞争引起的冲突和矛盾。巴伯认为,应该通过参与型民主来转化冲突,通过公民参与、公共审议和公民教育将个体之间的分歧冲突转化为互助合作,但它并不是终止冲突,也不是拒绝、压制或者容忍冲突,而是转化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民主第一次将私人矛盾转化为公共的,将需要转化为相互依赖,将冲突转化为合作,将许可转化为自我立法,将需要转化为爱,将奴役转化为公民权的可能性被置于参与的情境之中”^{[1]148}。

三、当代中国民主建设对强势民主理论的镜鉴

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纽约时报》曾对此进行了如下评价,巴伯赋予参与思想以制度上的和智力上的活力……其独特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有关立法的建议,而在于他勾勒出一种从可能出现的强势民主的实践来看待的方式。在批判自由主义民主“弱势”意义的基础上,强势民主理论重新诠释了“参与”在民主中的核心地位,传承了民主参与的古老传统,对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强调以公民身份为依据来实现个体角色的转换,发挥了公民自治的积极作用;重视以共同体为基础来促成公共意志的达成,提供了公民互动的有力依托;运用公共参与、公共讨论来转化个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加强了公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毋庸置疑,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为整个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当然,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也一直因为缺少“现实性”而饱受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在保持民主的抽象精神上,这种更强调参与和运用公民身份的观念是一种值得钦佩的观念,也是非常

高调的梦想,但是,在现代大众社会的背景下却只是荒谬的要求和不切实际的幻想。”^[1]1990年版序言,3 尽管如此,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中所蕴涵的充分的民主参与、独立的公民身份以及依存的共同体等理念对于当前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都具有理论上的指导和现实上的借鉴意义。

1. 发挥基层民主的直接参与,提高公民自治水平。扩大基层直接参与和实现基层民主自治始终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和方向。巴伯的强势民主并不强求参与在所有层次上的普遍推行,而是推崇群众在基层领域直接参与的充分实现,这对推进我国基层民主的制度建设和价值取向和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此,党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3]长期以来,我国在广大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以及城市中的基层社区自治制度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当前,要进一步提高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最主要的就是在制度建设上,要进一步建立一套保证人民直接参与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体现的民主规则和民主程序;在价值取向上,必须着眼于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和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路径上,必须围绕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开展工作,通过扩大公民的直接参与和集思广益来提高公民自治水平,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积极化解各种矛盾,使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促进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改善、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

2.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动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壮大。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强调以公民身份为立足点,通过参与符合共同利益的持续的共同政治活动来密切公民个体之间的联系。其中所蕴涵的公民社会、政治参与、参与共同体等理念既是实现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毋庸置疑,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实现公民民主权利和维护公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4]。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一方面是指要扩大公民参与,强调纵向的各个层次和横向各个领域的参与扩大,实质上是民主的增量问题;另一方面是指公民的参与以及参与的有序性,强调的是公民参与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实质是民主的效果问题。在公民有序参与的过程中,公民身份的转换、民主素养的提高以及民主能力的深化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由于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处于转型之

中,中国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仍呈现出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因此,要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必须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形成公民的自主意识、自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深化公民有序的参与意识,逐渐拓展公民的参与能力。正如托里·戴蒙德指出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不但提高了民主政治的责任能力,而且提高了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和生命力”^[5]130。

3. 构建共同协商的长效机制,促进公共意志的表达和实现。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强调通过共同协商和讨论来转化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促进共同利益的达成。在民主参与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冲突和分歧是民主政治实践中不可避免。因此,要形成共同意志就需要公民个体之间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公民可以了解他人的立场和公共的利益,体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宽容,从而超越个人利益、情绪以及偏执的态度,承担起属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最终促进公民共同意志的达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城乡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沟通和协商的制度形式,如民主恳谈会、民情恳谈会、便民服务窗、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证会、民主议事会等制度,这些制度和形式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示范和带动作用。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种协商式的公共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政府权力和既有权权威结构的影响,它的有效性和制度的可持续性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6]。因此,在推进民主建设的进程中,公民沟通和协商的形式必须通过制度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建设而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效机制,为公民参与协商和有效沟通提供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促进符合人民利益的公共意志的达成,推动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共治。

参考文献:

- [1] [美]巴伯.强势民主[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 [2] [英]道格拉斯·柯尔.社会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21.
- [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5] 刘军宁.民主与民主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 陈剩勇,吴兴智.公民参与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例[J]. 学术界,2007,(5).

[责任编辑:刘建明]